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



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



扫二维码 大学视界

慕课平台建设的“官”“民”之思

■本报记者 王之康

最近,深圳大学慕课办公室主任孙忠梅心情有些低落。

虽然 2018 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拟授奖成果在去年 9 月公示时,她就已知道校长李清泉主持完成的“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”获得了二等奖,但是当最终获奖名单公布后,她还是难掩心中的失望之情。因为在她看来,曾经获得 2017 年广东省教育成果奖高等教育类特等奖的“优课联盟”,在这次评选中希望能作为地方高校的代表获得一等奖。

对此,自 2013 年就开始接触慕课的某高校教师陆鸣也深感不平,因为在他看来,这个汇集了 129 所地方高校的优课联盟的应用效果要明显优于很多同类的慕课平台,比如教育部的“官方平台”——中国大学 MOOC。不过,他不得不承认,“中国大学 MOOC 要比优课联盟这个‘民间平台’的现实发展环境好很多”。

实际上,这一情况不仅仅出现在上述两者之间,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慕课平台当中。众所周知,慕课对于当前高等教育具有特殊意义。因此,如何应对官方慕课平台与民间慕课平台之间的发展矛盾,如何有效进行慕课平台建设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,便成为当前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。

背景不同水平不均

在孙忠梅看来,平台在慕课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,因为它是连接高校、教师团队、企业的重要运行机构。“各高校建设的慕课一般只能给自己用,要想用到其他学校,就需要慕课平台这座‘桥梁’来实现,尤其是在跨校应用、线上教学服务与技术服务等方面。”

如今,我国有很多慕课平台,上海交通大学在线课程建设负责人余建波将其分为以下几类:一是官方发起的,如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在线;二是高校发起的,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、深圳大学的优课联盟;三是企业发起、高校或联盟合作的,如智慧树、超星尔雅、高校邦。

不过,慕课平台虽多,但发展却是不均衡的。正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、清华大学教授李志民所说:“平台方是慕课资源的组织者、推广者和运营者,平台的号召力决定了平台能吸引到什么老师、什么课程,是否是官方背景、是否和教师职称评选挂钩都会成为平台的潜在竞争力。”

对此,余建波给出了一组数据。“现在,教育部在做‘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’评选,我们通过分析评选出的课程发现,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在线、智慧树这三个平台极具优势,约占精品课程的百分之八九十。”他举例道,比如一共评选 800 门课程,中国大学 MOOC 大约会上 600 门,学堂在线和智慧树加起来大约会上 150 门。“从这个角度来看,其他慕课平台就失去了阵地,不存在竞争优势了。”

正是因为拥有官方背景和在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”评选中的天然优势,所以更多老师和课程才涌入这些慕课平台,导致发展不均衡的现状。

重视评选而轻应用

不过,就像文章开篇所言,陆鸣担忧的是,官

“慕课建设标准尚未达成共识、核心专业必修课等慕课课程的跨校应用模式有待探索、市场化运作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等,都是当前和未来慕课平台建设过程中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。”

方平台并未将这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。比如中国大学 MOOC,对学生的管理太弱,无法监控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行为,同时,与老师的交流也不充分。“学生是否真正去学了,老师是完全无法掌握的。”

对此,余建波解释道,虽然中国大学 MOOC、学堂在线、智慧树三个平台吸引了大量的老师和慕课课程,但它们却各有特色。

“中国大学 MOOC 的使用者侧重于社会学习者,大概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社会学习者,而非在校生;智慧树的使用者 90% 是在校生;学堂在线的使用者中,社会学习者和在校生的比例则各占一半。”他说,使用者是在校生的话,慕课平台就更注重教学运行的过程管理,教学运行效果会比较好,而社会学习者的随意性比较大,课程完成率很低,大部分课程的完成率只有 1% 或 1%,因此过程管理也就没那么严谨。

而之所以中国大学 MOOC 的使用者多是社会学习者,余建波认为,“可能是由于宣传渠道的原因,主要通过网络渠道而来。”

虽然如此,陆鸣却依然担忧,因为“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”评选的导向作用,客观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隐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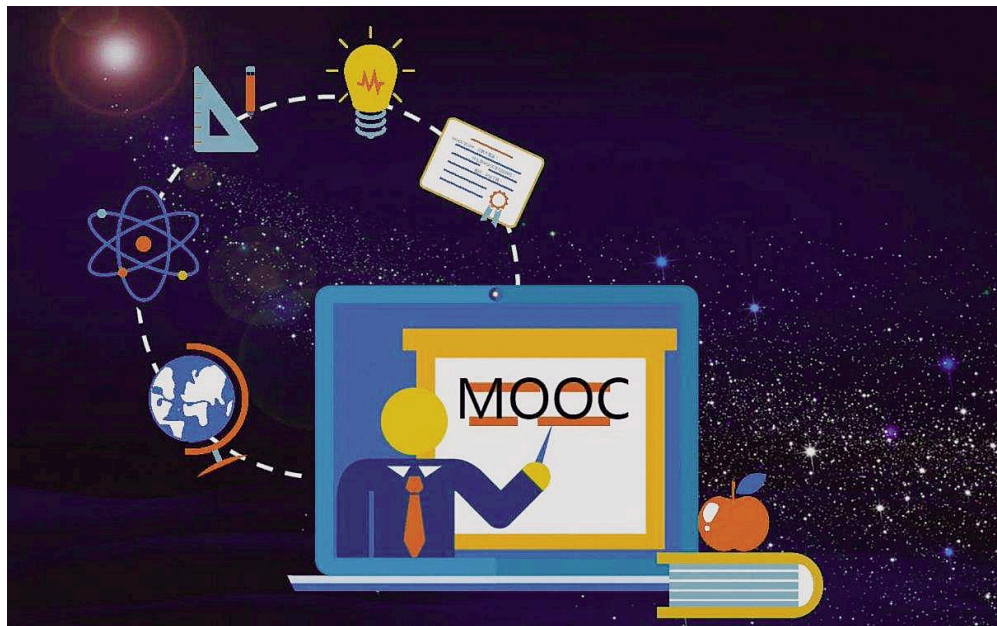
“‘慕课宣传周’的举办和‘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’的评选,让冷了两年的慕课再次快速发展起来。各高校也极为重视。毕竟,评选上精品课程,对学校来说‘面上很好看’。”陆鸣担心,很多人会把精力放到慕课课程建设与精品课程评选上,而对慕课课程的应用却重视不足。

其实,他的担忧不无道理,始于 2012 年的精品资源共享课评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当时,各高校响应教育部印发的《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工作实施办法》,从内部评选出优秀课程,进行课堂全程录像,放到教育部官方网站“爱课程”上,但如今,课程依旧在,观者却寥寥。

平台建设现状堪忧

事实上,除了官方平台与民间平台发展不均外,当前,我国慕课平台建设更严重且更需要



及时解决的,是可持续发展问题。正如李志民所说,至少到目前为止,国内的慕课平台几乎都是在亏损运营,长期找不到盈利模式,“这就需要考虑是否应该将慕课平台设计成非营利性组织,以政府投资支持、开放校友捐赠等方式来维持运营”。

对于这一观点,余建波深表赞同。他说,所有慕课平台或者不收费,或者通过给其他学校提供选课服务收费、通过培训拓展课程资源收费,但都收费极少。按照当前的运营情况来看,慕课平台基本上都处于亏损状态。“但每年的服务费用,包括流量费、平台的开发费用、系统的维护费用等,还是挺大的。总的来说,各个平台都要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。”

2015 年 4 月,教育部在出台的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》中,明确提出,慕课平台建设要形成“高校主体、政府支持、社会参与”的模式。

“而早在 2014 年 5 月,深圳大学就牵头建立了优课联盟,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。”孙忠梅说,四年多来,深圳大学一直在探索,后来成立了优课在线公司,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机制。但从目前来看,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,没有形成良性的运行模式。“从成立至今,深圳大学在优课联盟上累计投入约 3000 万元,包括教师课酬、助教费以及优课在线公司的平台开发、运行维护等,但是单靠一所高校来投入并非长久之计。”

此外,慕课建设标准尚未达成共识、核心专业必修课等慕课课程的跨校应用模式有待探索、市场化运作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等,都是当前和未来慕课平台建设过程中的问题。

亦官亦民融合发展

谈及慕课平台建设现状与慕课的未来发展,李志民认为,须在两方面作长足改变才有可能取得突破。

“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开放和认可在线学习学分认定,在线学习学分的认定,在流程上做得更加科学,通过制定一系列规范来评估线上学习

的有效性,并利用技术手段保障学习过程和测评过程的合规性。当然也需要人事用工方面的观念和政策变化。”他说,另一方面是在政策认可后,必然会出现新的商业机会,而商业机会必然会导致资本跟进,进而带来慕课技术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张。

对于未来慕课平台的理想模式,孙忠梅透露了她的设想:最好是分层次的、差异化的、特色鲜明的不同平台。“首先,平台的技术功能要先进,比如优课联盟,有人脸识别、直播、大数据分析,甚至学生成绩还能与区块链相结合。”她说,教学运营服务意识要强,慕课课程放到平台之上后,要有学生互评、老师互动等,而且要顺应师生的新需求及时进行开发、完善。“市场运作能力也要加强,就是在慕课资源的聚集与课程市场的拓展上,慕课平台要与学校、教师团队等形成一种良性的市场运行机制去推广。但这并非高校强项,所以最终还是应该形成公司化的运行模式,同时还能解决盈利问题。”

因此,她建议,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宏观指导和顶层设计上,引导全国形成差异化发展的不同慕课平台,以服务各类型的高校。毕竟不同层次高校的学生对慕课的需求程度也是有差异的。比如,优课联盟等民间平台着重服务地方高校、民办高校。

而且,慕课平台建设还应该分层次,教育主管部门在支持、指导中也要分层次,不能都在一个标准、层次上去竞争。“否则,对地方高校、民办高校等很难起到作用,最终有可能变成形象工程,失去其应有之义。”

采访中,余建波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。

他建议,慕课平台不必太多,有五六个即可,将一些小的平台、地方高校等纳入其中,就好比是淘宝商城与各个店铺的关系。平台提供运行规则和服务保障,并收取服务增值费。具体的教学工作还是由使用平台的老师、学校或机构来提供,它们运营具体的慕课课程,再相应收取课程使用者的费用。至于教育主管部门,则只需选择其中一些好的课程给予鼓励、奖励和认证就可以了。

“我常常跟我的研究生说:我们要有理想,但目前更重要的是有梦想。我们要有要求,但目前更重要的是有追求。我们要有志气,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要争气。我们要有热情,更重要的是要有激情。”年近耄耋之年,钟南山仍然为抗癌药物的研制努力着。

“不停地思考解决问题。”这是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樊锦诗提到的北大给他的传承。正是因为时刻保持清醒而审慎的思考,樊锦诗带领敦煌研究院建立了抢救性科学保护体系。“我们先要分析清楚,为什么用这个保护措施,它的机理、材料、材质。分析清楚之后,要弄明白怎么保护,我们要少干预,按原要求来保护。用什么材料,要试验;用什么工艺,要参考国际先进的理念,他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坚持经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,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。”

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先行者林毅夫提到,北大的学生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。“北大的潜移默化培养了‘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’的情怀。”林毅夫同时感谢了北大宽松的工作环境,这使得持不同观点的教师可以进行思想交锋,也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动脑筋说服教师,“这是不断深化理论的重要条件”。

会议尾声,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6 级本科生王昱博坦言,刚入学的时候,一佩上北大校徽,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。而直面一个个北大人的人生故事,“我对被选择的庄严感有了更深的理解”。

中国大学评论

高等教育作为初等教育之后的深造,其本身的“教育”功能从来没有让人怀疑过,国内出版的几本知名《高等教育学》著作无一例外地将“人的发展”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议题,就是一个证明。但这个承担“人的发展”的教育功能的主体——大学教师的职业地位和尊严,在今天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怀疑。

这些冲击和怀疑中,有些是浮于表面的。比如,过分强调大学职业化,让教师怀疑自己身份下降;对于就业率过分关注,影响了教学内容和效果;以及一旦大学教师出问题就引起围观等。

有些则并不是浮于表面,它们往往是潜藏在现象之下,或者通过某些事件表现出来。例如,近来几所大学课程考试的试卷中,不约而同地出现所谓“送分题”,即要求学生写出本学期所有授课教师的姓名。这类题目虽然引起争议,出题者却执意不改。这也说明,类似学生不承认授课教师的情况已经普遍存在,并且有蔓延的趋势。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教师的一点尊严亦表明,大学教师开始为自己的职业地位担心了。

在微信上,有一位在大学任教的网友将这种担心直接表述为“比老师睡不起学生更扎心的是,老师被学生睡不起”。这个颇有些调侃意味的另类表述,引起了同样在大学任教的网友们的共鸣。表面上看,跟帖者谈得最多的是教师上课是否点名问题,但其实,点名与否并非只是简单的教学程序,它关乎的是教师的自尊。因为如果靠点名来维持教学秩序,等于承认自己的教学内容枯燥无趣、缺乏吸引力,也等于承认自己无能。

笔者对此的回应是“要知道,上课不点名,学生还不买账,还要给你打低分,无论怎么解释也无效,这就是接受教育者的现状”。这不仅是想说“上课点名”作为衡量教师上课质量好坏的标准很荒诞,也是想指出当下的大学生已经欣然接受程序化、标准化教学的实际状况。

正是因为“被程序化”“被标准化”,让他们对于教师,乃至整个教育的要求变得与以往不同。简言之,教学的程序、教材和教学大纲都是最高标准,至于谁来讲授,已不再重要。

一方面是在担心职业地位的下降以及希望维护剩余额的一点自尊,而另一方面,也就是学生根本不关心谁来讲课,这一悖谬不仅是大学的两个中心——师生的现实关系的写照,也是整个大学教育面临的尴尬。

过去我们对于通过电视授课方式进行的远程教育的怀疑,主要是因为它的标准化、距离感,缺乏“人情味”,师生之间失去直接交流的机会,起不到教育的作用。但经过中小学长期应试化教育的培养,不仅标准化被学生接受,因教材和大纲上的知识点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,师生之间的交流除了考试之前询问考试范围以外,其他的时间都显得多余,距离远近自然也就无所谓了。

仅止于教材里的知识点交流,其直接的益处是有利于考试,但多数大学教师都不满足于应试。过去教师在课堂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教材里的观点提出异议,且引经据典加以论证是会赢得敬佩的眼光。但现在,教材和教学大纲才是至上权威,同样的讲授内容和方式引来的却是学生的不解和审视,甚至是不耐烦的等待,那意蕴仿佛也是多层的。第一层是提醒:“什么时候讲(教科)书啊?”第二层含有一点抱怨:“我们还要考试呢!”第三层仍与考试相关,只是更进了一步,变成了最后通牒:“你不要分数,我们要分数!”

学生只关心考试,只读(或学习)教材,其实也是对教师智力的一种藐视。对一向以智力超群而自豪的教师来说,同样有侮辱感。

将近六年前,笔者曾撰文指出“‘应试的一代’倒逼教育改革”(见《中国科学报·大学周刊》,2013 年 5 月 9 日),但这个“狼来了”的呼声如今已经成为现实。而国内大学对此的反应,反而是在迎合“应试”。

那位网友有关“老师被学生睡不起”的担忧或许不会马上变成现实,但如果大学管理继续向“应试化”靠拢,继续以“与国际接轨”为名推动繁复无比的极端标准化、程式化而非“人性化”的所谓“专业认证”,这实在不能算作“杞人之忧”了。

『应试化』挑战教师的尊严和地位

尤小立

寻找改革先锋的共同点

——北大师校友共话改革开放 40 周年

■本报记者 韩天琪

踏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,在华灯的映衬之下,红红的背景上展示了一幅幅历史照片。展览分为“领导关怀”“经典瞬间”和“改革先锋”三部分。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改革故事。

2018 年 12 月 18 日,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隆重召开,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在庆祝大会上,北京大学 3 位教师、8 位校友受到表彰,被授予“改革先锋”称号,他们分别是于敏、王选、王家福、厉以宁、李彦宏、邹碧华、林毅夫、胡福明、钟南山、屠呦呦和樊锦诗。

不久前,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、林毅夫和王选的王夫人陈莹,北京大学校友胡福明、钟南山、樊锦诗、邹碧华的夫人唐海琳应邀回到母校,畅谈了各自在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历史征程中的感悟。

“如果要寻找他们身上的共同点,除了在北大学或工作的经历之外,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是以思想引领时代、以学术报国、以实干造福人民。”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在发言中说道。

思想、学术、实干

“刚才听了郝校长发言,我是学生。”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厉以宁谦虚回应,并由此打开了座谈的话匣子。

他最想讲的第一个问题,是怎么来看待 40 年的改革开放;第二个问题则是面对未来各种变化,中国经济怎么继续前进?“在这其中,观点的变化最为要紧。”厉以宁说。

改革开放的进程,不仅是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,也是科技日新月异的进程。其中,科学家的精神打动人心。

陈莹回忆王选生平时谈话,“在研究激光照排过程中,有人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”她给出的答案是,在老师、同事都认为王选不要再继续下去的时候,王选坚定地回答:“我不这样想。一个应用型的研究成果,如果不做成商品,对社会没有价值。之后,他一直极力促成科技成果转化,并不满足于得奖、提职。”

“为什么原来把他说是激光照排的发明人,而这次把他看作科技体制改革实践探索者,

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他提出,科技顶尖、市场立地,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开发高质量的商品,这样对社会才有推动作用。”陈莹继续解释道。

发表于《光明日报》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福明,结合自身在北大的经历,谈及爱国、科学、民主、进步思想对他的启迪。

邹碧华独创审判工作方法成为法院系统学习的宝典,2014 年他却不幸因公殉职。唐海琳回顾了邹碧华的先进事业与忠诚敬业、乐于奉献的品质。

大学创新和个人求索

大学对人的塑造,首先是理想信念的塑造;大学对人的影响,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影响;大学对人的浸染,最有分量的是家国担当的浸染。

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钟南山在分享中提到,北大留给他最宝贵的财富是“严谨工作、实事求是”的理想信念。正是凭借这样的信念,他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坚持经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,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。